

第 一 章

语言的人文性与人的语言性

20世纪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性特征：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之中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而语言正是人类创造的最完善的符号体系。

古代埃及人曾把全部过去的时分三段，即神的时期，英雄（酋长）的时期和人的时期。作为人类这三个时期的典型象征，则是三种不同的符号语言。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这三种符号语言作了论述。他指出，第一种语言是神圣的心头语言，表现于无声的宗教动作或神圣礼仪。在罗马民法里还有从这些动作或礼仪里保存下来所谓法定手续（代表语言或文明的动作和姿态）。这是他们执行一切民政事务都要使用的手续。这种语言属于宗教，由于宗教的特性，人们敬重它比起就它进行推理还更重要。在最早的时期人们还没有发音的语言，这种神圣的心头语言就有必要。第二种语言是英雄们的徽纹，盾牌就用徽纹来说话，这种语言在现在的军事训练中还保存着。第三种语言是发音的语言，这

是今天一切民族都在使用的。在这三种语言中，前两种只是某种象征符号的体系，但它们和日常语言一样成为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谢夫莱指出：社会乃是“诸有机个体产生在纯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不可分开的居住地，符号就是纯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它表达思想和技术活动，创造效益，并物化为人的思想产物的外部客体。”^①当代著名美国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莱斯利·怀特进一步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象征的使用”；正是象征“它把人类的一个婴儿变成人。”^②而语言构成人的最直接的象征（符号）世界和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毫无疑问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源泉。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对这一点说得更为透彻。他指出：在人类世界中有一个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即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生物体对刺激作出反应）之外，人还有符号系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作出条件反射，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于是，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个宇宙包括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宗教的仪式等。这些人物的象征符号（语言是其中最典型、最稳定的一种）编织成人的世界，以至于人不通过这些中介，就不可能看见和认识任何东西，也不能创造任何文化：工厂机器按物理、数学符号及设计图而产生，人的各种礼貌行为据长辈教诲和公共文件而产生……，“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④没

①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页。

②③ 转引自《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第29页。

④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人类世界的道路。而正是人类世界，才是正确解释宇宙秩序的关键所在。卡西尔深刻指出：“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①“正是言语的一般符号功能赋予物质的记号以生气并‘使它们讲起话来，’没有这个赋予生气的原则，人类世界就一定会是又聋又哑。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②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的公式：人——符号（语言）——世界（文化）。在人和世界的联系中，语言符号成为根本的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也有“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存在样式，每一种生物体都有它自己的经验，因而有它自己的世界。在某些生物种属的生命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并不就可以转移到任何其他的种属上去。两类不同的生命体的经验是彼此不能比较的，正如生物学家马克威尔所说，在苍蝇的世界中，就只有“苍蝇的事物”，在海胆的世界中，就只有“海胆的事物。”然而动物的“世界”只是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界。而人类则通过符号行为来确认自己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根本不同。人类依靠它的运用象征符号赋予事物以意义，进而创造文化的能力，不仅生息于自然界，而且生活在社会中，不仅生存在文化和价值里，而且生成在历史与未来中。时间与空间，事实与价值，事件与意义，思维与想象，实践与创造，理解与交流，痛苦与欢乐，构成无比丰富与多样的人类世界。这样一个世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②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界，是人类以语言符号为基本手段塑造出来的。同它相比，动物只有“环境”，没有“世界”。所谓“动物世界”只是对人而言，只是人类赋予生物群体的一种“意义”。

1.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性特点的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人性特点的，是打开人类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①“言谈者，仁之文也。”^②西方哲人也指出：“语言是心灵和它自己的契约，这个契约就象人之所以是人一样重要。”^③语言“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如果不把语言问题转向心灵问题之首，那么，对语言神秘认识的这种方式是不会被说清楚的。”^④从语言的起源来看，低等动物是以一种即时即刻的有限方式来应付它们的环境。它们的感官反映表现为“外部自然界突然跃入它的灵魂，并用这种力量征服动物的灵魂，使动物失去独立性和自由运动。”^⑤高等动物则是有不同等级的学习能力，它们的行动受以往经验的影响，人类将这种能力发展到极点——命名和交际。因为人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者，具有抗拒自然的自由意志。他超越了低

《春秋谷梁传》。

② 《礼记正义》。

③ 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载《两篇悬赏的征文》1789年柏林第二版第60~65页。

④ W. Von Humboldt, *Introduction a L'oeuvre sur le KaV*, 1835,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74.

⑤ 转引自贝尼季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

等动物的简单和固定的行为模式，使知识的巩固、接受、交流、记载有了可靠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人的心灵的解放，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窗口。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①莫里斯也认为：“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是和符号的作用不能分离的，即便我们不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②

从人的交际本质来看，语言同样是人性的特征。亚里斯多德曾说，人是政治动物；西塞罗说，人是社会动物；富兰克林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黑格尔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理性思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这一观点看语言和意识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无可否认，动物也有交际行为。现代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昆虫还是脊椎动物，都普遍存在可以分解为多种社会性联系的交际行为。如J·P 司各特指出：“交往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基本过程，因为社会行为本身的定义就是由同种动物其他成员所激起的，或对同种的其他成员有影响的活动。”^④但动物的交往往往是利用特殊的视觉信号（如萤光）、嗅觉中介（如外激素），即使有些动物能发出听觉信号，这些信号也不具备“延迟模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6页。

② 莫里斯《符号理论基础》转引自《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4页。

④ D·入德斯伯里等主编《比较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仿”(原型消失之后的模仿)、“移位”等认知机制,不具备能产性(即不能用这些声音组成新的信号)。塔夫尔卡曾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界的交往划分为六个水平,即植物水平,振奋水平,时相水平,信号水平,符号水平(灵长类动物以姿势,面部表情和声音等形式产生的反应类型),语言水平。他认为只有语言水平才是局限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有的交往行为。①显然,用语言水平的交往作为人与其他生物的交往行为的划界是完全正确的。“动物之间,甚至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②人类学的研究证明:正在形成中的人,为了适应多种捕获食物形式,“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楚的音节。”③与此同时猿类也扩大了各种表象的范围。这样,言语前的阶段也就过渡到行将言语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基本的音韵,随着音韵也形成了基本的概念,言语的发生正是在有意地制造最原始的石器工具的时期开始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④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还说:“人天生宜于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⑤语言水平的交往不仅是人的交往行为与其他

① T·A·Sebeok, *Animal Communication* 印第安娜大学出版社 1968年版,第75~102页

②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51页。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页。

⑤ 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册,第383页。

动物的交往行为的一道划界的“门槛”而且是人类原始思维由动作思维到表象思维，最终进入语言意象思维的一个分水岭。如皮亚杰所说，在人类的符号——认知发生过程中，心理表象和图画表象作为语言符号的前身只是一种“前语言阶段。”当人类的动作思维摆脱“行为”的羁绊，把思维的外壳从身体活动转向心理表象时，就为更加抽象化的语词概念思维的发生奠定了必要的心理基础。观念和思想这些较高级心理层次的信息参与到解决问题情境的演变中来。人类的符号功能随之发生了质变：语言系统从原始的叫声信号中迅速超升，发展成为具有开放性、能产性、双向交流性和抽象性等基本特征的新的代码符号，这使人最终成为人，因为人开始了他所特有的符号活动。而在这之前，人只能以手势、姿势等动作语言和面部表情来进行交往。对于语言作为人类符号功能高度发展的标志，社会语言学家勒克曼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一提到语言，便在社会交际的发展中跨过了一道门槛。它把社会交际分成‘自然，和‘历史，两个系统。社会交际系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交际主要成分的语言因而无疑是进化过程的结果。但语言是特殊的交际系统，其产生过程不是那么直接，……作为历史语言代码的语言并不把种系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交际的古老成分完全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语言成为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社会交际系统，并取代了过去作为主要代码的原始形式，但社会交际古老组成部分的一些要素，如与手势、姿势、面部表情有联系的那些最重要的成分继续与语言并存。”^①更重要的是，无论语言的产生与较早、较原始的社会交际系统有多么复杂的进化联系，语言一旦产生就成为一切观念形态的渊源，直接拥有整个人类心灵。“我们

^① T·勒克曼《语言在社会中》载《国际社会科学》第2卷第4期，1985年。

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听觉印象和与之相关的引起发音的运动印象，是一切言语和一切思想的历史渊源，不管追溯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曲折。”^①语言不仅拥有人的心灵，它还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人的灵魂。国际科学委员会编的《非洲通史》第一卷里有一章叫“逼真的传说”，其中详细谈到口头传说在非洲文化中的作用，指出“口头传说就是知识的总和”，“口头传说是生活的一所大学校，它包括并影响生活的各方面。”“口头传说以传授和经验为基础，约束着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有助于造就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有助于塑造非洲人的灵魂。”正因为言辞在原始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非洲，“言谈被看作是各种力量振动的形体化或具体化，”“每一事物都是具有体形的言谈，这就是宇宙万物皆能讲话的原因。”总之，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思维符号从有象到无象，始终沿着不断抽象化的道路前进，以语言为直接媒介的思维必然取代以各种形象或意象为媒介的象征思维，这是发生学的必然趋势。“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②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构成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自身的伟业和语言的产生同步开始，须臾不可分离。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因此，语言是人性的最高表现。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2. 语言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

前面说过，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因为语言是文化本身的基础，它由一套无意识但又极其复杂的“规则”和设计构成体系，包含了人类对世界的知识和行为准则。

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家拉康认为，文化的任何表现同语言功能（也即同象征符号观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象征符号性的东西包围着人，伴随着人的一生。人的行为应与之相符合的一切规矩，一切禁条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象征符号性的东西”在人的心理上起到内在组织的作用，使人与周围的文化环境相调适。而这种“象征符号性的东西”是同语言联系在一起。构成人的文化行为的习惯性因素是一种无意识，但这种无意识也是有结构的——“无意识的东西是象语言那样构成的”。语法和语言表达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体现着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维样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认识的是自然世界，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人文世界，艺术创造的是一个想象和审美的世界，宗教则开拓了一个神灵的世界。而这一切，都在作为人类实践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载体——语言中得到了表现和包容。世界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在语言中得到了统一，人类通过语言的幽深入微和巨细无遗，把握了多样化的世界。

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观，首先是因为语言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在个体发生学的意义上，语言是我们所感知、所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人是按照他的语言

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当我们透过母语这块透镜来观察事物时，事物已按照我们母语的体系被分了类。例如空中存在无数星辰，我们不去一个个地研究，而是把聚集在一起的一些星辰取名为狮子星座、大熊星座、天鹅星座、双子座等。所谓星座，不是星座本身客观存在着，而是特定的人从地球上某一点眺望空中，把一些星辰任意地联结在一起，观察的结果很象狮子、熊、天鹅等，因而得名。又如我们把黄瓜、土豆、萝卜、白菜等称为蔬菜，把桔子、苹果、柿子、葡萄等称为水果。这种分类正是通过语言的棱镜获得的。在自然界的秩序中并没有蔬菜和水果的区别。世界万象原是个混沌的连续体，人类特定的集团根据一定的观点，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蔬菜和水果的世界，也就是给混沌的连续体以一定的秩序。有时候，事物本身是有种属秩序的，只是由于人们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忽略”了这种秩序。例如雌性禽、畜肉嫩味美，又分别能产蛋、乳，人们饲养家禽家畜以雌性居多，饲养雄性只是为了与雌性配种。因此，就西方的一些语言来说，在一般场合就无须分辨雌雄，而以雌性禽、畜的名称统指。英语中hen、duck、cow、sheep都是雌性动物，但它们又同时不分雌雄地指称鸡、鸭、牛、羊。可见语言对世界的分类带有人的很大的主观性。“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所在。”^①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符号能容易地从一种官能转移到另一种官能，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可见单只语音并不是语言的基本事实。语言的基本事实毋宁说在于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形式构造，和概念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

① F·R·Palmer: *Semantics*, cup, 1982, P·21.

式。’^① ‘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根据人类集团的语言习惯建立起来的。’^② 玛克斯·德索也指出：“虽然也许文学的效果在一开始以感觉意象的存在为条件，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多余的了。语言已经凝聚成一个世界，一切精神效果都隶属于它，就象隶属于外在世界一样。”^③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民族的语言棱镜所折射的世界是很不相同的，那些差异之点往往反映出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不同样式。例如原始人类是通过社群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来认识现实的，最初由社会加工出来的声音组合体往往表示“我们”、“我们的”和与之相对立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而“我们的”意味着“好的”；“不是我们的”意味着“坏的”。于是在一些原始部落的语言里一切都被划分为两个：“我们的”和“不是我们的”。在非洲的某些语言里，时间的区别不是依据客观标志，而是依据“吉利”、“不吉利”这就是不同部族语言的特殊分类法。巴西的巴凯里部落把所有的人都分为两类：*Kypa*和*Kypana*。前者意指“我们全体”、“我们的”；“好的”、“我们的人”；后者意指“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坏的”、“吝啬的”；“有病的”。他们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来自别的部落。加利福尼亚的约基部落把所有的事物分为两类：

(1) 约基部落的成员，(2) 其余的整个世界。非洲马萨依部落的语言里将人分为男人和非男人两类，女人、儿童、奴隶属于后一类。英语、汉语、日语中都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而塔加洛吉语则分为雨季和旱季。英语对职业的分类中有 *Professional* 一类，它包括 *Clergyman*、*medical*、*doctor*、*lawyer* 及 *architect*，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13页。

② 萨丕尔《文化·语言和个性》转引自《语文导报》1986年第7期第36页。

③ 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accountant 等，汉语中没有这样一类。而汉语对职业的分类中有“知识分子”一类，它包括科技工作者、文教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英语中没有这一类，英语的 intellectual 和 intelligent 的近于汉语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往往是指某种气质。如我们可以说：“This dentist is a good specialist but not an intellectual”。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民族越是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它的“语言分割”就越是细密。例如奴厄尔部族的经济生活主要取决于牲畜，这使得奴厄尔人的文化要求集中于这一方面。奴厄尔语中有许多词来指称牲畜的不同颜色（包括不同颜色所处的位置）、大小、品种、行为和价值。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生活中牲畜也占有重要地位。牛有不同年龄的名称：犊（二岁牛）、犝（三岁牛）、犗（四岁牛）、犛（牛子），不同颜色的名称：牝（白黑杂毛）、犛（黄色虎纹）、牝（白脊）；犛（黄白色）、犝（黄色黑唇）、犛（纯白色）等。不同性别的名称：牡（公牛）、牝（母牛）等。猪以性别分为豕（公猪）和豨（母猪），以年龄分为豨（三个月）、豨（六个月）、豨（一岁）、豨（三岁）等等。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马亚印地安语有相当详细的词汇以表示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玉米，它的各个部分，它的耕作、收割和烹调方式。澳大利亚某些土著语言中有许多词分别表示不同的沙。总之，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详尽，反映文化现象的词汇其数量与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成正比。文化上的要求使人们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重视某些区别而忽视另一些区别。这种情况还往往表现为下义词丰富而上义词阙如。阿拉伯语中有6000个词表示各种各样的骆驼，包括不同的性别、年龄、种类，及行为方式，但没有一个泛指骆驼的词。有些语言中有许多词用以表示不同品种的棕榈树，但没有一个词用作总称；用不同的动词表示“洗手”、“洗脸”、

“洗身子”但没有一个泛指的动作“洗”。这种下义词丰富和上义词阙如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思维的具体性和缺乏综合性和概括性。同一个事物的不同形态，不同部分、不同阶段都可以有特称，但却没有综合、抽象的语词概念。英国人一向重视畜牧业，以牧羊为主。养羊又以剪羊毛（进而纺织衣料）为主要目的，羊毛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大宗出口商品，成为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至今英国上议院议长还是坐在一袋羊毛（woolsack）上。因此英语对绵羊（sheep）和山羊（goat）有明确的区分而且sheep又指好人，驯顺善良；goat指坏人，淫荡邪恶。（成语the sheep and the goat就指“好人和坏人”）汉语自古对山羊和绵羊统称为“羊”，在日常语言中很少加以区别。反过来，汉族人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对于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严格区分为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因为亲疏有别，权利义务不同。而英语中只用uncle一词统称之，既无父系母系之别，也无长幼之别，只有性别的区分，即uncle和aunt的区别。如果以汉语和英语为两个极端，那么处于中间状态的是拉丁语和斯拉夫诸语言，它们都有父系母系之别，而无长幼之别，如拉丁语把父系的叔叔、姑姑称为Patruncus、amita，母系的舅舅、姨称为avunculus、matertera，在澳大利亚的尼亚马尔语中甚至连父亲和母系男亲属，母亲和母系子女亲属都没有分别，前者统称mama，包括父亲，叔叔、姨夫、祖父的兄弟的儿子，祖母的姐妹的儿子。后者统称ngardi，包括母亲、姨、婶婶、外祖父的兄弟的女儿，外祖父的儿媳、祖父的儿媳等。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亲属关系秩序，都有自己对家庭伦理的语言分割，从尼亚马尔语的亲属世界来看，汉语的亲属世界是不可理解的、陌生的，这并不奇怪。这正说明语言是“强加”给使用该语言的社团成员的一种“世界观”。每一个儿童，他所认识和感受到的世界，就是根据他所在语言集

团的词语符号进行相应的分类与排列的。其实，不仅事物的分类如此，动作的分类也是如此。汉语的“拿”可以细分为持（枪）、执（剑）、秉（烛）、操（刀）、握（笔）；英语只有用 *hold* 或 *grasp* 来对译。汉语严格区分用体力负运东西的动作，不但说明负运的工具和方式，而且限定负运的事物，如荷（锄）、挑（土）、担（水）、提（箱子）、背（孩子）、负（重）、挎（篮子）、拎（包裹）等，而英语只用一个 *carry* 来统称这些动作，这里所反映的两个不同语言的动作同两个民族——以游牧为主（英人），以农耕为主（汉人）的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内在的联系。

语言不仅在概念体系，意义体系上是一种世界观，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前面我们说到英国人把 *Sheep* 作为驯顺善良的象征，*goat* 作为淫荡邪恶的代表，可是在客观意义上 *sheep* 和 *goat* 无所谓善恶。一种民族语言对毒草、药草、杂草、益虫，害虫，猛兽、珍禽、野兽、家畜的分类，都体现了该语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在其他民族看来可能很古怪。凯库吉语把用作木材的灌木叫做“切”，把既不能用作木材又不能食用的草木叫做“皮母”，把一部分能食用的植物叫做“阿古纹克”，这同英语的 *grass*、*shrub* (*bush*)、*tree*、*herb*、*weed*、*flower* 等的分类相比较就体现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好”、“坏”、“大”、“小”、“高”、“低”甚至勤劳，懒惰，在不同的语言集团中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委内瑞拉的法依卡族认为偷别的部族的东西是好事，阿拉伯的伯多纹族认为给就要死在沙漠之中的外族人喝水是坏事，中国人认为听话温顺是好孩子，美国人认为有独立见解的是好孩子。总之，不同语言集团之间在意义体系上的世界观没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在价值体系上的世界观也没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不同民族的语言世界都具有文化相对性 (*cultural relativity*)。语言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也不需要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来评价不同语言世

界观的优劣。

那么，人类的语言世界观难道就不能有普遍、共同的“观点”吗？不同语言世界观的差异难道不反映语言集团之间在心智上的差距吗？这是文化人类学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例如，不同的民族语言对颜色的分类往往是不同的，描写语言学家格里森曾调查比较了英语、shona语（罗得西亚的一种上著语言）、Bassa语（利比里亚的一种土著语言）划分色谱的不同方式，结果如下图：

英 语:	purple	blue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shona 语	cips wuke		citema	cicena	cips wuke	
Bassa 语	huj			zī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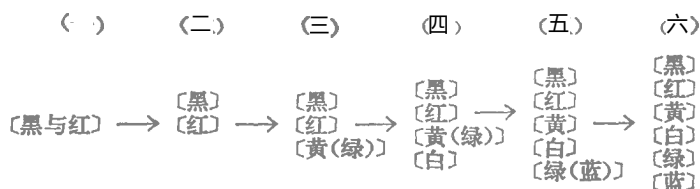
人类学家康克林调查了菲律宾Hanunóo语，发现它主要用四个颜色词表示各种颜色：

1. (ma) biru, 表示黑、紫、蓝、深绿及各种偏暗的色调。
2. (ma) Lagtiz, 表示白色及各种较亮的色调。
3. (ma) raraz , 表示栗色、红、黄、橙色。
4. (ma) latuy, 表示浅绿、黄、浅棕色。

各种语言对颜色的不同分类有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呢？看起来好象英语的分类更合理，但Bassa语的分类也有其合理之处 植物学家通常将黄、橙、红色的花划为一类，蓝、紫、紫红色的花划为另一类。为此需要有两个能够分别概括两大类颜色的名称，

① Gleason, H. A.,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Bassa语的两个颜色正能满足这一需要，英语却无能为力。面对人类语言多元的颜色秩序，人们不禁陷入了困惑：这究竟是生理进化的不同，还是语言秩序的不同呢？1858年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在《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一文中比较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一些描写颜色的文句后指出，荷马时代的古希腊语只有很少几个抽象颜色词，它们的意义往往含混不清，这说明古希腊人色觉器官有缺陷，辨色能力不发达。1867年德国语言学家盖格尔进一步指出，人类随着辨色能力的提高，能够区分越来越多的颜色并加以命名。人感知颜色的顺序跟颜色在自然光谱上的排列顺序一致。因此，一种语言的颜色词至少分作六个阶段先后出现，即：



按照这样的假说，语言世界中颜色分类较少的民族不过是辨色能力进化慢而已。按照这样的理论，那么很可能推断不同语言的世界观有着高下优劣之分，反映了人类心智进化的不同阶段。1880年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发表《关于原始民族的色觉调查》。他设计出一套包括：白、黑、红、绿、黄、蓝、棕、紫、橙、灰10种颜色的色片 (color chips)，附以使用方法，调查目的的说明，然后让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商人等把它们带到世界各地土著居民中调查。从五大洲的61个调查点获得的材料中，他得出以下结论：

1. 颜色的命名与感知能力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一种“原始”的语言往往缺乏抽象颜色名称，但这并不是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们不能区分某些颜色，而是因为这些颜色的区分对他们来

说并不重要，所以他们就不从语言上加以分辨；相反，只要有必要，他们对某些事物的颜色在语言上区分得比现代文明民族还要细致入微。

2. 最先明确得到语言表达的色彩是红色，然后依次是黄、绿、蓝色。

3. 光谱上相邻的颜色，其语言表达也经常相混。最容易混淆的是绿与蓝。

4. 在一种只有两三个颜色词的语言里，红色名称可以包括所有波长较长的颜色（红、橙、黄）黑色名称可以包括所有波长较短的颜色（绿、蓝、紫）。总之，马格努斯的调查说明，各语言集团感知颜色的生理能力并无差别。色谱是一个连续体，只不过由于文化模式不同，各种语言对这个连续体作了任意的划分。一种语言的颜色词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人们感知颜色的经验，这些颜色词又反过来规定、限制了人们表达颜色的可能。因此，事物的物理存在，对于人来说，还不是清晰的存在，只有当人们根据自己的母语系统（语法和意义）确认它的存在时，它才真正存在。

20世纪60年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证明：人在视网膜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感色器官（圆锥细胞）。它们分别感受红、绿、蓝三种光波，并能根据色混合的规律产生黄、橙、紫等混合色的感受。视网膜中的三色细胞系统在视觉神经通道中又会转变为四种不同的神经反应，即：

1. +红 - 绿 （+表示只感觉，-表示排斥）
2. +绿 - 红
3. +黄 - 蓝
4. +蓝 - 黄

因此从生理上说人不能形成一种红与绿或黄与蓝的复合的感觉，